

历史学家随

一苇争流

来新夏随笔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 新登字 01 号

策 划 彭 匈 曹光哲

责任编辑 李庭华 曹光哲

责任校对 陈红燕

历史学家随笔丛书

一苇争流

来新夏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 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9.375 印张 200 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5 月 第 1 版

1999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219-03965-4 /K·801

定价: 15.00 元

序 言

《诗·卫风·河广》云“一苇杭之”，《疏》称：“言一苇者，谓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其意以一束苇即可得一小舟之用。魏文帝是曹氏建业之主，当黄初六年东巡，“临江观兵，戍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慨然赋诗曰：“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睥睨江东，气吞天下，跃跃然有渡江南下以求一统之势，所赖者亦惟以一叶小舟渡航耳。菩提达摩由南而北，路经金陵与梁武谈法不契，于是即就芦丛中成苇一束，并以之渡江入嵩山少林而得道，创中国禅宗之始。坡公游赤壁，或悟达祖一苇可航之意，于是在《赤壁赋》中大吐豪放之气而吟诗曰：“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其意亦

以乘小舟即可凌波万顷。一苇虽小，其用实宏，固不得以其小而忽其用。

我学写随笔历十余年，每成一文，犹掇苇一支，惟一时难以成束，而私衷则无日不期其成束。岁月积久，成文已近百篇，似可聚为一束，但尚感纤弱无力，不足以当小舟之任，乃复不计时日，傍计算机而坐，敲打不辍，日掇拾于芦丛，终于撰成《冷眼热心》、《路与书》、《依然集》、《枫林唱晚》、《邃谷谈往》等五种，自以为当可成一坚实小舟，虽不如魏文之成霸业，达祖之悟大道，坡公之纵豪气，而我之一苇或亦能浮沉于随笔巨波中顺流而下，顾犹以未能争流而渡为憾耳！

今春，戴逸教授应邀为广西人民出版社所策划之“历史学家随笔丛书”主编，依学科十人之例，网罗及我，同卷诸君子莫不学识优长，而我徒增马齿，益感惶悚难安，惟竭尽全力，祈能比肩并进。乃按编辑条例规定，自成书中遴选若干篇，以示始基之历程；复增新作若干篇，以见近年之进益，合成一册，俾一苇将不仅局于顺流而下，更望其或能争流而渡。环视丛书诸家作者，济济多士，正罄其所学，出以美文，亦犹百舸之争流；反观自我，不过一苇，惟小舟固不甘于目送百

舸，于是奋起一篙，以小舟而跻于百舸，争流而前，庶乎渡江有望。时书方成册，尚无以名之，遂以《一苇争流》为名以明志。幸知我者不以一苇而笑其渺小，更不以争流而嗤其为蚍蜉，则愚愿足矣！

来新夏

一九九八年冬月于南开大学遼谷

目 录

序 言	1
-----------	---

管 窥 蠡 测

藏书文化与人文精神	3
中国近代图书范围的扩大	8
不可忘记的黑色数字	11
受伤的民族感情	20
天津香港的相通命运	23
继续加强清史研究	27
方志的起源	31
旧志经济资料初检	36
给城市区志一席之地	42
企业史志的传统	47
为十万修志大军一哭	51
论“二冷”精神	55
挑水还是倒水	58
一字之漏	61
追本求原	64
灯下挑眼	67
老言无忌	70

往事如新

我的书斋邃谷楼	77
我所住的城市	81
五大道寻旧	85
我的旧居	89
初整北洋档案	91
我写《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94
我为《书目答问》做汇补	96
下乡	100
第一次干农活	103
出夫	106
返城	109
旧藏的怀念	112
我的第一本随笔集	115
也无风雨也无晴	119
枫林唱晚	121
长寿园碑记	124

还看今朝

清代目录学家张宗泰	129
日藏汉籍与黎庶昌	133
近代地方文献学家陈作霖	136
王先谦的功过	143
张謇：能受天磨真英雄	147
评说汤寿潜	153
以“破伦”精神藏书的伦明	162
张东荪其人其学	165
名门后裔张公黼	171
难忘师恩	177

激扬文字

书名之学不应漠视	197
《四库全书》与儒藏	201
不要再嚼甘蔗渣	204
一流作者一流书	207
《探微集》探微	210
于细微处见学问	216
吹尽黄沙始见金 ——评《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219
后学的职责	226
写好家族历史	230
《甲午战争前钓鱼列屿归属考》日译本序	233
《走进困惑》序	239
读连横的《台湾通史》	244
流人的书	253
夜读《史记》 重温题记	259
《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序言	265
读清人笔记随录	270

管窥蠡测



藏书文化与人文精神

中国的藏书文化包含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它的核心则是“仁人爱物”。所谓“仁人”便是把书的作用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结起来，使所藏尽量发挥其作育人才的社会功能。从官藏来看，早在老子主管周藏室时，便曾热情地接待孔子来查阅百二十国史记，彼此还进行了学术研讨。魏晋时期，国家藏书还曾应读者的借阅要求而赠书的，如西晋皇甫谧向晋武帝借书，武帝应求赠书一车。唐宋各代也将官藏作部分开放，如北宋的官藏即向一些官员开放，如因工作需要还可经过一定手续外借。清代尤注重官藏利用问题，在四库全书纂修以前，多位学者就有机会抄录官藏《永乐大典》所收各书，有一些重要而散佚的著作得到抢救。学者全祖望、徐松等都做过抄录工作，而《宋会要稿》之类的重要

典籍因此得以流传。《永乐大典》还被《四库全书》作为采录佚书的来源之一,使古代文化能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四库全书》修成后,不仅北京文渊阁可有条件地备人参阅,更在南北要地分建六阁,以便各地士人就近抄用,嘉惠士林,保存和普及文化,所尽仁人之心,功不可没。公藏如书院之藏书本以供士子阅读为主旨,自不待言。至私藏之体现仁人之心更为显著。东汉末年学者蔡邕私藏近万卷,当他发现王粲是一位文采斐然的好学之士,虽然其女蔡琰也颇有学识,但他还是要将藏书数千卷赠予王粲以作育人才(《太平御览》卷六一九)。宋晁公武之所以能写出一部私家目录名著——《郡斋读书志》,也是得力于他得到四川转运使井度的慷慨赠书五十篋,使晁公武合个人私藏,然后去其重得 24500 余卷,乃录诸书要旨而成《郡斋读书志》,体现了藏书文化的仁人效果。藏书文化的仁人精神不只局限于汉民族圈,也润泽着周边各民族,并循着文化同化律的趋势发展。辽、金、夏各族以本民族文字大量翻译汉籍,与当时各民族的政治民生密切相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元 1190 年由西夏编成的《蕃汉合时掌中珠》是汉夏、夏汉的对译字典,在夏字旁注汉字读音与汉字释义,汉字旁注夏字对音和译语,两两对照,极便检阅,对沟通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起了重要作用。元朝也很注重提倡藏书文化,译书有《通鉴》、《九经》、《贞观政要》等等。其文种之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已超越前代。尤其是设立秘书监的分监,颇类似图书馆的分馆,也可视作一种流动图书馆。分监原是随着皇帝去上都避暑时带一些备参阅的政书和类书,但因年年如此,也便形成固定的制度。运书既有苇席、柳箱的包装,又有专人押送,并可经过严格的手续在一定

范围内流通,这是前此所没有的措施(王士点:《元秘书监志》卷三)。

有些藏书家为了发扬藏书文化的“仁人”精神,亲自为人办理藏书借阅,如南齐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少年来家借书,他都“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南史·崔慰祖传》)。有些人如晋范蔚藏书7000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他不仅提供阅读,还为读者“置办衣食”(《晋书·范蔚传》)。明清两代不少藏书家逐渐树立外借流通的观念,如明末藏书家李如一就持“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的观念,所以他“每得一秘书遗册,必贻书相闻;有所求借,则朝发而夕至”(钱谦益:《跋陶南村〈草莽私乘〉第二跋》)。杨循吉的《题书橱诗》更直抒“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的慷慨气度。许多藏书家都把借阅抄录作为丰富知识,扩大藏书的一种方法,如世学堂纽氏、澹生堂祁氏、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天一阁范氏等大藏书楼都曾接待著名学者黄宗羲进楼抄书。黄氏也不忘所本,真诚地名其藏书处为“钞书堂”以志来源。黄氏之成为清初大学者未始不得力于此。藏书文化亦随之而大放异彩。

藏书文化的爱物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图书的爱护上。从汉代开始,就用竹制小箱子(篋)将图书分类置放,以免损失破坏,东汉发明造纸术后,使藏书保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用浆将纸染黄后再用以防蠹(刘熙载:《释名》)。魏晋时代有一个名叫曹曾的人,家多藏书,他为此修了一个石窟以藏书,称为曹氏书仓。隋朝是藏书文化趋于高潮的时期,它虽立国日浅,炀帝又是后世所非议的人物;但他爱护图书的心极强而为史籍所称道,如《旧唐书·经籍志》即盛称:“炀帝好学,喜

聚异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甚至博学如宋人郑樵也在其所著《图谱略》中极称“隋家藏书富于古今”。它不仅注意典藏，还对图书的形制爱护备至，曾精选其正御本写五十副本，分上中下三品，用不同颜色的卷轴分藏书室，并建立起能自动启合的门窗和书橱等设施。唐承隋风，私藏图书超出万卷者已不在少数，而爱惜图书者更非个别。如李泌藏书三万余卷，对经史子集分别标红绿白三色以区别藏书质量。宋代除注重图书形制外表的保护改进外，还对图书的内容进行纠谬正误的校勘工作，由崇文院总管秘阁和内府藏书的整理和校勘，并规定每日日课数量，有一大批著名学者如曾巩、苏颂、黄伯思等都对校订官藏有所贡献，为后世留下重要的经验。学者对个人私藏尤加用心，宋敏求家多善本，颇着意于校书，更利用这些珍本文献著书立说，成为一代著名学者。尤袤著《遂初堂书目》著录图籍的各种版本，开版本学研究之先河。明代范钦精心营建的宁波天一阁，是至今巍然独存四百多年的古代图书馆，在它二百年后的清乾隆帝为四库全书建阁存书时犹命地方督抚绘制天一阁图纸作建阁依据。它不仅拥有七万余册的藏书量，被誉为藏书天下第一家，而且对爱护图书作了多方面的设想，如防火、防蠹、防潮、防散失等等措施，更是蜚声海内外，为世人所称道，充分体现了藏书文化的爱物精神。其他许多藏书家也多注重图书的装订、刊印和收藏，是可见藏书文化精神的普及程度。尤其是对古善珍稀的典籍更视若拱璧，不惜巨资大量地精工传抄，因而有吴抄、文抄、王抄、沈抄、姚抄、祁抄、谢抄和毛抄等著名抄家，特别是毛抄更是驰名遐迩，后世所谓毛边纸之称就是毛氏抄书的专用纸张。这种一时成风的抄书活动的文化现象极大地丰富

了藏书文化的内涵,应给以充分的研究。清初以来,藏书文化有显然的长足发展,不仅官藏、公藏注重搜求典藏,还由政府组织了工程浩大的《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有选择地概括了古代、中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将抄本分置在自东北至东南的繁盛之地。私藏尤为普遍,几乎凡是学者无不藏书,藏书者无不是学者,其区别仅在于数量之多寡。藏书文化的意识已牢牢地树立,藏书文化的精神得到极大的发扬。不少学者为了丰富所藏,不惜移居书市附近,以便捷足先登搜求到佳本善刻,当时声名卓著的学者如王士禛、罗聘、孙星衍和黄丕烈等都在京师旧书集中地附近居住,这无疑是推波助澜地使慈仁寺、琉璃厂成为最大最集中的藏书文化的中心而历久不衰。学者们在这里交流藏书,传播文化,培育人才,研讨学问,从各方面研究图书,于是版本、校勘、目录、辑佚等专学相继出现,逐渐完善,成为清学的主要部分。不仅如此,若干富商巨贾也被藏书文化的洪流卷进去了。他们毫无吝啬地藏书、刻书,养士编书,对藏书文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由于全社会能从仁人爱物的角度来重视藏书文化而把藏书文化推向了鼎盛。

以仁人爱物为中心而构成的藏书文化,对社会、民族素质的影响很大。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转型期板块移动和撞击的波及,不仅藏书文化的观念逐渐淡漠,而且藏书词汇也在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头脑中接近消失,这是一种非常可怕而严重的反文化现象,非常需要我们竭尽全力来提倡和宣传以仁人爱物为中心内容的藏书文化!

中国近代图书范围的扩大

历代公私藏书多以四部及丛书为主，间有其他，亦为数不多。近代以来，学术门类日广，著作者的视野拓宽，外来文化的不断输入，致使图书的种别与数量大为增加，主要是译书和有维新与革命思想内容的书刊。译书从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他借助于政治条件的便利，广泛地搜罗翻译人才，大量翻译西书西报；友人魏源主要根据这些材料相继纂成《四洲志》和《海国图志》，开启了研究西方、介绍西方的风气，许多有关西方史地内容的图书出现了，如《瀛寰志略》、《中西记事》、《通商始末记》等即是。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时期，译书活动达到高潮，从单纯介绍西方史地知识外，政治、科技等方面尤为集中，如洋务运动的三四年间，在中外翻译家互补短长的情况下

译书近千种。在戊戌变法前夕,维新派人物更推波助澜地把译书活动更推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译书应“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方;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为原则,但实际上仍以西书为主,如王韬译有《格致西学提要》、《普法战纪》等;英国浸礼教派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五六年间共出版了《泰西新史揽要》等译著三十余种,特别是著名翻译家严复在1898年以来的十余年间先后译有《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等八大名著。林纾也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据《译书经眼录》的统计,二十世纪的前五年出版的主要译著共25类533种,约为前60年译书量的总和,其中译自日本的虽起步较晚,但后来居上,所译图书有321种,占全部译书量的60%强。大量译书的出版为旧有的典藏增添了新的内容。

另一类具有维新与革命内容的图书也风起云涌地出现,最先是太平天国图书,太平军自在南京建政以后,就注重出版图书工作,设立刻印图书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实行“旨准颁行诏书书目”制度,最多列有二十九部。这些革命图书在其失败后,虽多遭禁毁;但尚有流传海外,后经学者抄回者。六十年代以后,维新分子大量著书立说,鼓吹改良,冯桂芬、郑观应、王韬、马建忠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著有若干具有维新变法内容的图书行世。二十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展开,革命书刊盛行一时。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白浪滔天的《三十三年落花梦》等等以及明末清初一些反清思想家著作的重行出版,为图书的典藏又增添了新内容。尤其是报刊的大量编印,除改良与维新两派进行对立宣传的《民报》和《新民丛报》外,尚有其他革命派所发行的报刊